



江立中 著

離騷探驪



江立中 著

雜
駢
探
驪

岳麓書社

封面设计:洪 琪

责任编辑:张铁燕

离骚探骊

江立中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巴陵石化天冠商社激光照排

巴陵石化化工区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0.000 印张:6.625 印数:1—2.000

ISBN:7—80520—396—2

I·229 定价:5.80 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斟换

目 录

离骚探骊序	宋祚胤(1)
前言: 史诗·屈原·民族魂	(2)
一、离骚散论	(12)
1 高阳之疑	(12)
2 三寅之寓	(18)
3 三后桀纣	(22)
4 滋兰树蕙	(25)
5 朝谇夕替	(29)
6 回归故里	(32)
7 女嬃之詈	(35)
8 南访重华	(39)
9 上求天帝	(42)
10 下索佚女	(46)
11 灵氛吉占	(49)
12 百神吉故	(53)
13 决计出走	(57)
14 生死抉择	(61)
15 绝命之词	(65)
16 政治激情	(70)
17 艺术形象	(73)

目 录

18	民族之魂	(76)
19	楚族史诗	(82)
20	自传结构	(88)
21	象征体系	(94)
二、	离骚释义	(102)
三、	离骚探骊	(154)
1	试论屈原的叛逆性格	(154)
2	《离骚》是屈原在《九章》基础上总汇其它诸篇的再创	(166)
3	两曲归去情 异采各天成	(182)
4	屈原研究的三座里程碑	(190)
附录:	屈原与龙舟文化	(201)
后语		(211)

离骚探骊序

宋祚胤

江君立中曾问学于余。君明敏而善为深邃之思，绩学而能发幽隐之义，故多醇醇精湛之言，绵绵贯珠之作，甚可喜也。十余年来，君致力于屈原赋甚勤，已得足以名世之文章若干篇，都为一集，曰《离骚探骊》，要以发屈子之精卓自励，非妄许得珠也。李太白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于屈子道德文章之推崇淋漓尽致；而“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之意亦稍稍见之矣。是屈原之所拳拳而于一篇之中三致其意者，实楚国社稷是忧，非昏暗怀王为怀也。然则谓屈原为爱国则可，谓为忠君则不可。此意李氏沿太史公而隐约言之，至立中始畅论之，撰成《试论屈原的叛逆性格》，收入《离骚探骊》，并入选于中国屈原学会公开出版之《楚辞研究》，而许为研究屈原爱国思想在新时期之代表作，诚名实相符，非阿其所好也。近年来或有诋毁屈原，以为非爱国者。诚然，屈子所眷恋之“旧乡”、“故都”，其为国也确有异于今日。然今日之国，宁非“旧乡”、“故都”之演进邪？不能谓滥觞者非江水也。是屈原之“九死未悔”，实我国古代爱国思想之大放作作之芒者，何能斥而去之邪？立中而为之大声疾呼焉，其有造于我国优良传统，非浅鲜也。

前 言：

史诗·屈原·民族魂

中国和希腊这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各自的童年时代都产生过十分丰富的神话故事，何以中国没有产生出象《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那样的史诗来？荀子有云：“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劝学》）。不同民族的发展进程，不也应当这样吗？中国和希腊这两个民族，当他们呱呱堕地的时候，睁开双眼，身边的一切都觉得新鲜，他们用同一种方法表述了自己最初的智慧的闪光，这就是神话。可是，当他们年岁既长，各自对自己周围一切的认识和理解，就各因其环境、经历不同而异趣了。拿文学而言，翻开希腊文学史第一页就是“培养了整个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客观地描绘外部世界的叙事长诗。而打开中国文学史，在它的源头耸立着南北相峙的两座巍巍高峰——《诗经》和《楚辞》——纯属个人感情抒发的抒情诗歌（当然《诗经》中也有少量的叙事诗）。

这两个古老民族在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时的这种“长而异俗”，是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使之然。且让我们翻开世界史，看看荷马史诗的故乡：

希腊半岛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这两个海又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希腊半岛不仅东西南三面环海，而且具有世界上最曲折的海岸线。全希腊地区除北部外，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距海达五十公里以上。爱琴海中的岛屿星罗棋布，总数

在四百八十以上,象跳石那样密布在海面上。航海的人在晴天挂帆出海,随处都可以望到陆地和岛屿的影子。

爱琴海地区又是一个多山地带。希腊的主要山脉有西北部的品都斯山和东北部的奥林普斯山、中部的巴拉撒斯山,南部的太吉特斯山等。群山把希腊半岛的陆地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不少地区彼此闭塞。由于多山,可耕面积受到很大限制,找不到象东方大河流域那样的沃野^①。

这就是希腊神话的故乡,这就是孕育荷马史诗的地方。因此,希腊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常以地中海为背景来展开,并充满了神奇冒险的情节”^②。随着航海业的发达、城邦经济的形成,希腊文学便朝着叙事性的史诗和戏剧的方面发展。于是在公元前九、十世纪前后形成了荷马史诗;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现了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三百多个悲剧。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吮吸着两河乳汁长大。黄河、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此,尽管它东临太平洋,却没有必要向大海发展,“直到战国时代,才开始有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等遣人入海求仙之举”^③。中华民族一直以农耕为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编》中说,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尽管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这与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由于地理的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的形态当然也就不同;不同的经济形态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古代文明;这种文明相互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却又同样光辉灿烂;正是这种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发展,塑造出各自的民族个性。

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抒情诗和散文。单就诗歌说来,《诗经》中的作品,从体制到内容,颇似希腊的田园诗,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抒情诗。由于中华民族主要蕃衍在长江、黄河流域,一直

以农耕为主,请看《老子》的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生长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我国哲学家老子所描绘的当时中国人的理想生活的蓝图。直到老子以后一千年左右的东晋诗人陶潜笔下的理想社会模式的“桃花源”,描写的仍是这样一派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一千八百多年来,倾倒了多少纯真老实的中国人!就是我国古代的神话“虽然也有许多神奇浪漫的幻想,但多与生产活动直接联系,有一种独特的质朴风格”^①。这与商业繁荣,以地中海为背景,靠远征掠夺别人财富发财的希腊人的生活绝然不同。当时希腊的社会组织不象中国人的以家庭为基层单位,以家庭利益为基础,而是以一个个的城市为单位,以城邦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他们经常同不同的民族、风俗、语言的人打交道,因此他们不少人就有一肚子的“山海经”故事。加上海上的远征掠夺,必然产生大规模的长时间的群体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社会事件,这就为长篇社会叙事诗(史诗)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产床和摇篮。加之继荷马时代的希腊城邦的形成,以及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之间断续绵延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又为三大悲剧诗人的三百多个戏剧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舞台。

黑格尔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起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②。这论述是对的。中国有产生民族史诗的“武库”和“土壤”,而且象《诗经》中的《玄鸟》、《生民》、《公刘》等一些关于商族、周族开国历史的诗篇,也都已经到达史诗的门坎前边,只是没有继续前进,向门里迈出那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我们不必因此而遗

憾,因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民族形式在前进的道路上建造了同样不朽的丰碑:“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创作了“卓绝一世”的“逸响伟辞”《离骚》等作品,已经够我们骄傲的了。

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要流传下来,它必须是群众性的集体创作。而长篇作品能口耳相传下来,则全靠作品情节的“多异而可传示”的特点。至于结构的严谨、形象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优美,是后世整理者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作品只可能是叙事性的,如荷马史诗那样的作品绝不可能是抒情性的。但宏篇巨制的抒情诗一定要有十分丰富的抒情诗作和比较成熟的诗歌理论作为土壤,凭借诗人的文采才能完成。

屈原创作的《离骚》,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长篇巨制,是以《诗经》三百多篇作品和以“诗言志”为核心的诗歌理论为沃野,以大一统前夕战国中期的中华大地为背景,凭借了屈原高洁的志行和天才的艺术才得以完成的。可以说,荷马史诗与《离骚》这样划时代的杰作,都只能在它们各自产生的此时、此地才能出现。

《离骚》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它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⑥。屈原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⑦,成为中国文学之父。翻开屈原的作品,“在充满了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却是这样一位执着、顽强、忧伤、怨艾、愤世嫉俗,不容于时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在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熔化成了有机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⑧。

《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荷马史诗在希腊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荷马培养了整个希腊”;屈原是中国文学之父。荷马史诗“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并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⑨,在西方古典

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任务，他把人民群众的诗歌提高到高度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以后无数诗人的创造道路”^⑩。

中国丰富的神话没有发展出史诗，中国的民族文化却哺育了屈原。屈原的天才作品《离骚》，不是叙事诗，似乎算不上“史诗”，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就了荷马史诗在希腊文学史上成就的贡献，在艺术成就上，具有史诗般的价值。郭沫若同志说：“他（屈原）是在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创造他的诗歌，因而他的一生也就成为了一首不朽的悲壮史诗”^⑪。

匈牙利学者托凯把《离骚》称作介于史诗和抒情诗之间的悲歌，他说：“中国当时社会的特殊条件是悲歌产生的温床：古代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的发展，而反对家长制的伟大诗人既要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不放弃创造史诗的宏伟意愿，因此形成了悲歌这样的体裁”^⑫。托凯认定屈原创作《离骚》的本意，是要为我们创作中国的民族史诗，是有道理的。

希腊之有荷马史诗，中国之有《离骚》，这两个古老民族走着不同的道路，用不同的民族文化形式攀上了世界文学史的顶峰。

屈原之大，首先在于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爱国思想的光辉。“屈原的爱国思想是非常执着的，根深抵固的，至死不变的，历史上少有其比，而在他那个时代尤为特出，所以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思想”^⑬。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和主要形式，在秦时强化了楚人的复仇思想，从两汉以下，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内聚力量，屈原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

先秦的爱国思想，是历史的范畴，只能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国从夏代即开始步入文明社会。夏、商、周三代似乎已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其实，三代也只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相传中

国文明出现之初,就曾经是小邦林立武王伐纣前,与诸侯会于孟津的有八百之多。这种氏族集团的联盟,循血缘关系的发展而来。屈原在《离骚》一开头就写“帝高阳之苗裔兮”,即是这种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遗韵。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据此写作“楚之同姓也”,还不很出格,至于张德纯《离骚节解》中分析说:“首溯与楚同源共本,世为宗臣,便有不能传舍其国,行路其君之意”。这就近乎郢书燕说了。因为“高阳”是我国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并不只是楚的祖先。这句话的本意,我想就如同我们现今海内外同胞所说的“炎黄子孙”差不多吧。屈原以“炎黄子孙”而自豪,或有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责无旁贷之意。周初武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⑧也是以同姓诸侯为基础分封的。诸侯之间朝会聘问,相互往来,一时和平共处,无不是以血缘为纽带,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家族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周天下“徒建空名于诸侯之上”^⑨。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诸侯都是独立的邦国实体。弱国的依附,也决不是依附周天子,而是依附于强大的诸侯国。当时人们的爱国,爱的只可能是这种诸侯国。所谓尊王攘夷,只不过一句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口号而已。冯友兰先生把春秋战国比作我们今天的国际社会,周与诸侯,如同今天的联合国与各会员国^⑩,确也形象。特别是战国时代,“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土无常君,国无定臣”^⑪,有什么统一而言?到秦王扫六合,建立秦王朝,中国才“天下一君,四海一国”^⑫,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统一。如果因此而论定秦以前的中国人没有爱国思想,那么,我国人民的爱国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国人民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么?显然是荒谬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爱国,就是爱自己的诸侯国。这种对自己国家的爱,在先秦已经大量地见之于经传。连周游列国而暇不暖席的孔老夫子在“去父母国”时,也悲戚地说:“迟迟吾行也”^⑬。爱国思想最深厚的是楚人。因为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楚人较之中原各国,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原各国同饮黄河水,在周

礼的制约下有着共同的文化。楚人则以江水为乳液,“辟在荆山,筼路蓝缕,以处草莽”,到屈原,楚已建国近八百年了。楚文化虽然日见与中原文化融合,但始终有别于中原文化。楚建国以来,被中原各国视为“夷狄”“南蛮”,就是只比屈原早死十一年的孟子,也斥楚人为“南蛮缺舌之人”^②。在司马迁的《楚世家》里,记录了楚王熊渠和武王熊通都曾自称“我蛮夷也”,以反抗周王朝的约束。中原人瞧不起楚人,《诗经》中不见《楚风》,却留下不少凌辱楚人的诗,如《商颂·殷武》:“挾彼殷武,奋发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愆”。楚人备受欺凌、歧视,因此,楚人爱楚国的行为特别感人。如《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楚召陵之盟,楚将屈完在强敌面前大义凛然,表现了楚人众志成城的卫国意志;《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申包胥乞师救楚,“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终使秦王感动的爱国精神;《左传·成公九年》载楚人钟仪被俘到晋国,“南冠而系”,“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关于屈原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当时只能在楚国出现,前人之述甚详;其实,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的屈原诗篇,也只能是楚产;在当时的中原各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中原各国处于“土无常君,国无定臣”的局面,国家的观念,爱国的思想是比较淡薄的。在屈原以前,爱国行动南北都有,只是南方比北方更多更动人,但爱国思想整个还处于朦胧状态,还没有在政治、伦理、思想上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把这种爱国行动升华为缠绵悱恻的爱国主义思想,史诗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源头。

屈原的爱国思想,淋漓尽致地集中表现在《离骚》中。《离骚》最使人戚戚动情的,是诗人对于自己理想的坚持精神。他的“美政”理想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改革楚国政治,达到振兴楚国,从而由楚国统一天下的目的。可当时的楚朝廷里,“众皆竞进

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特别是“哲王又不寤”。诗人的“美政”自然不可为。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上下求索，冀君王之一悟，并不惜个人的安危，“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直到已经看到楚国气数已尽，才毅然以身殉国。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作品，是秦以前中华民族近三千年文明的必然结晶，它奠定了尔后二千年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主题。

屈原的投江殉国，当时在楚国的反响当是相当强烈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②不是吗？楚人一炬，秦王系颈！历史的进程常走着曲折的道路。“六王毕，四海一”，好像是楚国被灭亡了。可曾几何时，汉又代秦，刘邦、项羽都是楚人，却又是楚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楚人的报仇复国，何来其速也？“其亡也，以屈原鸣”^③，屈原以生命谱写的这曲曲爱国主义悲歌在楚人复国思想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中国的真正统一自秦始，秦是短命王朝，实际是自汉始。汉朝政权，又实为楚政权，因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屈原因以尊，屈原的作品因以显。作为楚文化主旋律的屈原爱国主义思想便渐渐成为中华民族封建意识的传统精神。

我国的古代文化，随着长江、黄河的走向，形成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最初当是土生土长，独自地随着两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后来大约于春秋时期开始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主要是楚人不断向中原文化学习的结果。到战国中后期，楚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庄周哲学与北方儒家学派对立，形成儒道互补的局面；“楚材晋用”，说明楚文化培养的人才众多，已输入到中原各国；“楚辞”的取代“雅、颂”而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单这三个方面就说明楚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过中原文化。但南北文化的真正彻底的合流是在秦

汉的统一之后。特别是汉代统治者,为着巩固统一的需要,在定儒学为一尊的同时,又大力提倡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并逐渐滥觞为汉朝大赋,而成为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当然,汉人只是从学习屈原的文彩着眼,故尔汉赋后来近乎成了粉饰升平的宫廷鸦片,直到建安年间,曹氏父子为领袖的建安文学,才又恢复了屈原作品的神采,而使中国诗坛在屈原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斯大林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因为作家创作的艺术典型,对读者世界观的形成,对他们从思想、品德、性格到作风、生活习惯等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这样凭着汉统治者对其作品形式的提倡,象毛毛春雨,“润物细无声”,渗透到中华民族血液中,培养了我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此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与祖国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强烈,显然是祖法屈原。今天,为了台湾回归祖国,海内外中国血统的不同国籍的志士,都在“帝高阳之苗裔兮”的变奏曲“我是炎黄子孙”的旗帜下做着工作,这种精神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子精神正一脉相承。

屈原创作了二十五篇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就了文学之父的崇高地位;屈原以身殉国的爱国行为,赢得了我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因而人民用盛大民族节日的形式,世代永远纪念他。能象屈原这样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名垂史册,又作为民族魂而永远活在全民族人民的心里,这在中外历史人物中都是唯一的。

注:

①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②④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话》,见湖南师院中文系《语文教学》1978年第一期。

③袁珂《神话论文集·略论(山海经)的神话》。

⑤黑格尔《美学》,引自公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史诗吗》,见《文史知识》1985年第四期。

- ⑥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
- ⑦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 ⑧李泽厚《美的历程》。
- 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 ⑩《文艺报》1953年第11号社论。
- ⑪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见1953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 ⑫《中国悲歌的起源》，引自《文史知识》1984年第一期《楚辞研究在国外》。
- ⑬姜书阁《人民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见《屈原研究论文集》。
- ⑭《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
- ⑮《荀子·儒效》。
- ⑯柳宗元《封建论》。
- ⑰《中国哲学简编》。
- ⑱杨雄《解嘲》。
- ⑲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 ⑳《孟子·万章下》。
- ㉑《孟子·滕文公上》。
- ㉒《史记·项羽本纪》。
- ㉓韩愈《答李翊书》。

一. 离骚散论

1. 高阳之疑

《韩非子》里有一个“郢书燕说”的寓言故事，用来嘲讽那些在治学中穿凿附会的学者，至今发人深省。故事说，楚国郢都有一个，写了封信给燕国相。信是晚上写的，当时烛光昏暗，他叫端烛的人把蜡烛举高些，没注意顺手把“举烛”二字写入了信里。燕国相读完信解释“举烛”二字说：“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叫我们举贤授能。”他把这个意思告诉国王，国王于是在燕国任用贤才，因而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国家是治理好了，可是举贤任能却不是信的原意。

郢书燕说的现象在古典名作研究中还时有所见。越是名篇，燕相之说越多，影响也越大。

《离骚》是中外古典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二千多年来，说者如云，论著如山。其中成功之作不少，但燕相举烛之说亦常见。我们且看其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解释。

这句话是说：我是古帝高阳氏颛顼的后代啊。

根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高阳”，第一个为《离骚》作注的东汉人王逸解释说：“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之胤末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楚辞章句》）王逸的解释弥漫